特斯拉“拒交门”事件剧情更新 有拼多多团购车主顺利提车

本报记者 李乔宇

特斯拉“拒交门”事件又有新进展。

8月16日下午，一辆崭新的特斯拉Model 3停在秦先生（化名）楼下。“我开始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与团购，没想到成功买到了，特别开心。”家住上海的秦先生表示，目前其已成功提车，并为车辆办理了保险，成为通过拼多多补贴购买特斯拉并顺利提车的车主。

当被问及提车是否遇到问题时，秦先生表示一切正常，没有受到特斯拉的为难。“之后就是对接特斯拉官方销售人员，他们服务态度都挺好的，约定好提车时间后，提前办理了保险。”秦先生说。

而就在上述上海车主提车的前一天，特斯拉曾明确表示，拒绝向湖北武汉的团购车主交付Model 3，并取消了这名车主的订单。特斯拉还给消费者留下两种选择：要么到特斯拉官网重新下单，要么起诉特斯拉。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今年7月21日，拼多多平台宜买车汽车旗舰店推出了2019款特斯拉Model 3万人团购活动。拼多多方面补贴2万元，用户仅需支付25.18万元即可购买特斯拉Model 3。特斯拉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未与宜买车或拼多多就该团购活动有任何合作，也未与宜买车或拼多多有过任何形式的委托销售服务，亦未就此次团购活动向宜买车或拼多多销售过任何本司生产车辆。如消费者因上述团购活动产生任何争议或权益受损，特斯拉官方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8月14日下午，有媒体报道称，特斯拉已经拒绝向拼多多团购车主交付Model 3，来自特斯拉的交付专员声称，这一活动不符合特斯拉的交付政策。特斯拉方面表示，已拒绝向拼多多“限时秒杀”频道团购车主交付Model 3，并声称这批消费者涉嫌违反了特斯拉“禁止转卖”条款。特斯拉会依据合同违约条款单方面取消此订单。

“此类行为将消费者裹入品牌商和渠道商之争。”有接近拼多多方面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无论怎么争，都不能侵犯消费者利益，这个是底线。”

拼多多表示，已从相关消费者处证实，该车辆系消费者本人与特斯拉签了订购协议，消费者本人自用且无任何转卖意愿和意图。同时，对于特斯拉拒绝履行与消费者订立的合同，拼多多表示遗憾，支持消费者依法维权，并将积极落实车辆交付工作。

“拒绝交付并不是特斯拉与车主之间的简单纠纷，而是涉及拼多多在其中的折扣促销等商业活动。”谈及特斯拉拒绝交付产品一事，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另据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识产权律师游云庭表示，不反对正常竞争，但特斯拉单方面解除合同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如果消费者起诉特斯拉，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损失，法院大概率会支持。

“宜买车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特斯拉车辆的买卖关系，双方是委托支付的关系，宜买车受消费者委托，代为支付了汽车价款。”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邱宝昌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消费者在特斯拉官网下单，是与特斯拉签订的电子合同，现在单方面拒绝交付或取消订单，是违约行为。”

“特斯拉不应该歧视消费者、对车主区别对待。”邱宝昌指出，“在市场上做大做强的经营者都是依法经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重视并尊重消费体验，经营者绝不能仅凭一时的技术、销量领先，忽视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消费者感受，切记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才能赢得市场。”

贝壳找房上市首日市值破420亿美元 左晖称“发展最关键节点不以上市论”

本报记者 王丽新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上市的兴奋点。”北京时间8月13日晚，中国“居住服务平台第一股”贝壳找房创始人兼董事长左晖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感觉是被周围人给烘托起来了，天天很多人在那儿祝贺你，就好像觉得这是一个挺好挺大的事。”

当被问及“复盘从创立链家到成长为如今的贝壳找房(以下简称贝壳)，19年发展中最关键的节点”时，左晖向《证券日报》记者坦言，“我们的(最关键)节点不是以上市前后来论的，这就是一个事而已。”

同一时间，在大洋彼岸，整体募资规模超过21.2亿美元的贝壳在纽交所敲钟上市，股票代码为“BEKE”。上市首日，开盘价为34.71美元，较发行价大涨75%，盘中最高价至37.49美元，最高市值423亿美元。以当日收盘价计算，贝壳市值422亿美元。这一夜，在北京，贝壳人通宵未眠，跟他们同样未眠的，是投资人。

投资者 坚信创造长期价值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贝壳在国内采用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云敲钟”。在被邀请上台敲钟的人里，有一位投资人是华兴资本集团董事长包凡。华兴资本旗下华兴新经济基金在B轮后连续3轮投资贝壳找房。此前，包凡曾表示，“我们相信贝壳一定能创造出更多新商业奇迹”。

2016年和2017年，链家先后完成B轮和C轮融资，其中B轮融资规模为60亿元。2019年3月份，原投资方在链家的股份通过协议镜像平移至贝壳找房，同时，贝壳找房启动D轮融资。此轮融资过后，贝壳的估值超过百亿美元。随后，软银、高瓴、腾讯、红杉等资本大佬再次加持。

IPO后，左晖持股（B类普通股）26.2%，部分股东将其持有的A类普通股投票权授予左晖代理，因此左晖投票股权占比为42.4%，有82.8%投票权；腾讯持股11.1%，为第二大股东，有3.3%的投票权；软银旗下SVF II Shell Subco (Singapore) Pte. Ltd.持股9.3%，有2.8%的投票权，高瓴资本持股4.8%，有1.4%的投票权。

“资本是聪明的，很多投资人与我们都保持了长时间的沟通了解，坚信可以创造长期价值。”贝壳找房联合创始人、CEO彭永东向《证券日报》等媒体表示，做难而正确的事，一年两年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五年后就会有很大变化，好消息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投资人要在这方面看懂贝壳，跟我们坚定地站在一块儿。

“贝壳的模式比较复杂，很多人不一定看得懂。在此次IPO的几百场路演中，起初，投资者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你能跟我说一下，如果让贝壳类比一个企业，大概是谁？’后来，很多人有兴趣了解贝壳，就开始谈ACN(经纪人合作网络)、对行业的判断、平台化的路径。”彭永东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这时候就突然有了变化，大家现在会说，谁谁谁是中国的贝壳找房，我相信未来很多人会拿贝壳作为一个符号，这就是定义一种可能的商业类型。”

上市后 仍有很多方面需要提升

在“云敲钟”现场6分钟的发言里，左晖回顾了贝壳的“昨天”，有辛苦有坚持；谈论着贝壳的“今天”，有成绩有不足；展望贝壳的“明天”，有目标重价值。

招股书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底，贝壳找房平台进驻了全国103个城市，连接了265个新经纪品牌的超过45.6万经纪人和4.2万家经纪门店，为3亿家庭提供居住服务；三大主营业务为存量房交易、新房交易和其他新兴业务。“二手房是基本盘，是整个模式的基础。”彭永东表示，新房是贝壳看重的一个赛道，未来10年，新房与二手房占整个收入的比例大概各一半。

数据显示，2019年贝壳集团房产及租赁交易总额（GTV）达到2.13万亿元（人民币），营收460亿元，同比增长60.6%。在业内看来，真房源是整个组织乃至整个行业的正向价值驱动，线上线下“双网”是护城河，ACN重新定义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多服务类目构建起平台效应，当“双网双核”汇聚到一起，就注定了贝壳模式的领先。

至于被问及贝壳模式现在是否已经跑通，左晖表示，“目前贝壳完成了从0到1，还不算完全跑通。”基于此，左晖在“云敲钟”现场提出了三个新期待。其一，期待ACN完全跑通，实现门店“温饱线”（单店年成交金额达5000万元）、“中产线”（单店年成交金额达1亿元）；其二，期待产业互联网为产业链带来非常大的进步和增值；其三，贝壳能否在居住领域里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能成为一个商业组织，能给社会创造点价值，是对整个团队的最大激励。”左晖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而“消费者的反馈是对贝壳最大的激励，也是我们最主要的财富。”

当被问及上市之后最优先、最需要补强哪些方面时，彭永东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我一直不认为贝壳今天做得很好，产品、技术、业务、平台化运营等很多方面都需要提升；对自身能力的成长，我们永远不会满足。”

如此看来，上市并非终点，而是新起点。短暂的敲钟仪式过后，人员零零散散离场。彭永东鼓励员工们保持一颗平常心：“我们更知道哪些错误不能犯，贝壳的员工能够创造更多价值。”

芯原股份董事长戴伟民：
逆周期条件下快速增长 推动万物智联发展

本报记者 施 露

半导体产业链上游的国产替代如火如荼。

专注于半导体IP的芯原股份，即将在8月18日登陆科创板。根据上市发行公告，芯原股份发行价为38.53元/股，发行总数为4831.93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8.6亿元，超募比例为135.4%。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大环境较为复杂，半导体领域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芯原股份的业务模式具有逆周期属性，因此，在产业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发展的态势。受疫情影响，有些国家因为隔离等管控，更会考虑把订单给我们，从第二季度开始，我们公司国内国外订单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8月16日，芯原股份董事长戴伟民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即将登陆科创板

事实上，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的芯片都建立在国外公司的IP授权或架构授权基础上。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受制于人具有较大的技术风险。IP国产化是解决上述困境的有效途径，市场对国产芯片“自主、安全、可控”的迫切需求为本土半导体IP供应商提供了发展空间。

专注半导体IP和一站式芯片定制服务的芯原股份，则成为这一环节国产替代的重要标的。“IP业务方面，芯原股份至今已拥有自主可控的图形处理器IP、神经网络处理器IP、视频处理器IP、数字信号处理器IP和图像信号处理器IP五类处理器IP、1400多个数模混合接口IP以及低功耗蓝牙和窄带物联网等射频IP。”戴伟民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根据IPnest报告，芯原股份的半导体IP授权业务位居全球第七、中国第一。其中，芯原GPU IP（含ISP）市场占有率排名全球前三，2019年全球市场占有率约为11.8%；芯原DSP IP的市场占有率排名全球前三，2019年全球市场占有率约为8.9%。根据Compass Intelligence报告，2018年人工智能芯片企业排名中，芯原股份位居全球第21位，在中国大陆企业中排名第三。芯原神经网络处理器IP已在全球近30家企业的人工智能芯片产品中获得采用。

相比传统的IDM模式和无晶圆厂模式，芯原股份引领的是轻设计模式。“芯片公司不仅要轻资产，而且要轻设计，不必研发通用IP，也可以外包设计。所以我们是Fab厂和芯片公司之间的桥梁。有些IP产品我们是十年磨一剑，壁垒不是竞争对手短期可以突破的。”戴伟民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戴伟民表示，“30年前的台积电解决的是固定成本问题，造就了无晶圆厂芯片公司；芯原股份解决运营成本问题，引领的是轻设计的产业趋势。”

与传统的芯片设计服务公司经营模式不同，芯原股份的主要经营模式为芯片设计平台即服务（Silicon Platform as a Service，SiPaaS®）模式（以下简称“SiPaaS模式”）。该模式为芯原股份首创，通过观察全球半导体产业第三次转移以及集成电路产业技术升级的历程总结出的新运营趋势。

“有人说我们是芯片界的药明康德，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没有库存，没有市场风险，到最后其实边际成本会很低。芯片定制和IP授权要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规模效应。我们最大的风险是人才风险，为了防止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人才被竞争对手挖走，我们有很强的人才管理机制，其中包括全员持股，而且新员工基本是一进公司就有股权激励。公司离职率只有5%左右。”戴伟民笑着对《证券日报》记者称。

丰富的系统级解决方案

公开资料显示，芯原股份是一家依托自主半导体IP，为客户提供平台化、全方位、一站式芯片定制服务和半导体IP授权服务的企业。公司至今已拥有高清视频、高清音频及语音、车载娱乐系统处理器等多种一站式芯片定制解决方案。

但半导体IP公司之间的竞争，除了各家技术上的独特性，更多还要看建立生态的能力，ARM能够成为移动时代王者的核心因素，除了CPU和GPU架构等核心IP，还在于联合合作伙伴建立了IP核-芯片-应用的一体化生态，从而形成了高壁垒。

“芯原微电子未来会根据市场发展趋势，持续优化现有IP；并且考虑适时收购其他IP公司，面对不同市场，芯原的IP之间通过互相组合，形成平台化解决方案。此外，通过IP与公司设计能力结合，推出chiplet方案，再者是通过硬件架构和软件平台结合，推出系统级解决方案。”戴伟民表示。

从招股书来看，芯原股份也想在一体化生态圈有所建树，尤其是人工智能及物联网领域，芯原股份斥重金布局。此次芯原股份首发募集资金中，大部分将用于智慧平台等领域的建设。

在戴伟民看来，以广义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在可预见的未来内发展趋势明朗。物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将产生数以百亿计的连接设备，每台设备都需要集成诸多芯片，包括5G、NB-IoT等集成电路芯片和MEMS等传感器芯片，从而释放出大量芯片设计和IP的需求。

“这一块我们的规划是芯原现有的IP广泛适用于物联网设备，并针对物联网的低功耗诉求推出了一系列nano、pico版本。此外，我们还推出了面向物联网连接应用，基于FD-SOI工艺的低功耗蓝牙IP和窄带物联网IP等，未来芯原将通过智慧平台升级项目，进一步升级优化相关IP技术。”戴伟民说。

本版主编 姜 楠 责 编 陈 炜 制 作 王敬涛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上接A1版）坚决惩治掩盖不良资产，严厉打击做假账。商业银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之比，2016年一度超过128%，2019年末降至82%。3年时间里，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贷款5.8万亿元，超过之前8年处置额的总和。与此同时，加快补充资本，增提拨备，全面提升了各类金融机构应对外来冲击的实力。

四是违法与腐败行为受到严厉惩治。坚决整治不法金融集团和非法金融活动，有序推进资产清理、追赃挽损、风险隔离。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依法处理恶意操控金融机构的问题股东。推动高风险中小银行和信托公司“一企一策”进行改革重组和风险处置。一批官商勾结、利益输送、违法侵占的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其中一部分就是“监守自盗”的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

五是互联网金融风险大幅压降。一大批违法开办的互联网理财、保险、证券、基金和代币机构被取缔。全国实际运营P2P网贷机构，由高峰时期约5000家压降至2020年6月末的29家，借贷规模及参与人数连续24个月下降。

六是大中型企业债务风险有序化解。截至2019年末，全国建立债委会约2万家，实施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1.4万亿元。约500家大中型企业实施联合授信试点，债务约束的内生动力显著增强。

七是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遏制。2019年与2016年相比，房地产贷款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下降10个百分点。既满足房地产行业平稳发展的正常需要，又避免因资金过度集中出现更大风险。

八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初步控制。隐性债务是潜在的金融风险触发点。近年来，我国严控地方政府融资增量，严禁违法违规提供融资。同时，实施疏堵并举，有序化解存量隐性债务，金融系统积极配合地方政府进行债务置换。推动地方债在商业银行柜台面向个人投资者发售，为法定新增的地方政府债务提供多种资金支持。近三年，银行保险机构累计增持地方政府债券11万亿元。

九是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逐步健全。2017年至2019年，监管部门严肃追究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责任，处罚银行保险机构8818家次，处罚责任人员10713人次，罚没合计72.4亿元，超过以往十几年总和。

十是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明显提升。2017年至2019年，人民币贷款增加46万亿元。其中，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制造业贷款分别增加8万亿元、3.3万亿元和1.6万亿元。科研技术、信息软件、生态环保贷款年均增速分别达31.2%、20.8%和19.5%，显著高于同期贷款平均增速。小微企业融资总体实现“量增、面扩、价降”，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年均增速23.2%。贫困地区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接近99%。2019年大病保险覆盖11亿多城乡居民，农业保险风险保障金额超过3.8万亿元。保险赔款成为各种自然灾害后恢复重建的重要资金来源。

做好八方面工作

郭树清表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金融领域出现新的重大挑战，要切实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既要“稳定大局、统筹协调”，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推动经济发展尽快步入正常轨道；又要“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有序处置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从现阶段来看，做好以下工作尤为重要：

一是全力推动国民经济恢复正常循环。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在严格防控疫情反弹的前提下，全面恢复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强化财政、金融、就业、产业政策协同配合，特别要服务好中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促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是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金融结构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健全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矫正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两种不良倾向。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引导理财、信托、保险等为资本市场增加长期稳定资金。加快养老保险第二和第三支柱建设，推动养老基金在资本市场上的占比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三是尽最大可能提早处置不良资产。金融机构要采取更审慎的财务会计制度，做实资产分类，充分暴露不良资产。日常监管上，不简单将不良率上升作为评判标准。要利用拨备监管要求下调腾出的财务空间，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制定切合实际的收入和利润计划，增加拨备计提和资本补充。疏通不良资产处置的政策堵点，为提高金融体系稳健性创造更有利条件。

四是防止高风险影子银行反弹回潮。影子银行生存的土壤尚未完全铲除，稍一放松监管，极可能全面回潮，导致前功尽弃。要保持战略定力，对高风险业务保持高压态势。突出简单、透明原则，规范交叉金融产品，做到公募产品与私募产品边界清晰，表内业务与表外业务风险隔离，委托业务与自营业务分账经营，储蓄产品和投资产品泾渭分明。努力实现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与货币市场职责清晰、分工有序。同时，持续整治互联网金融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

五是及时处置不同类型机构风险。针对不同风险的机构，精准有效施策。对高风险金融集团，依照既定方案和分工依法依规处置。对农村金融机构，坚持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鼓励采用多种方式补充资本、引进战略投资者。对城商行和信托等地方法人机构，支持省级政府制定并实施处置方案，金融管理部门加强专业指导。抓紧研究提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对于名单内的金融机构，组织制定恢复与处置计划。

六是稳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公开透明、稳定可预期的监管政策环境，鼓励中外金融机构平等竞争、深化合作、互相借鉴、促进创新。提高开放条件下的宏观金融管理和防控风险能力，及时发现并有效阻遏外部冲击向国内扩散。

七是切实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和保护。加强金融知识普及，让城乡居民都懂得，投资是有风险的，世界上没有高回报低风险的金融产品，更没有所谓“稳赚不赔”的理财项目，宣扬“保本高收益”就是金融诈骗。简化产品结构，严格客户分层，如实通报风险。强化信息披露，提高市场透明度。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及时纠正误导金融消费者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八是进一步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近年来，拆除金融风险点的经验表明，加强党的领导是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凡实施风险处置和重组的金融机构，原则上都要成立临时党组织。对股权关系复杂的风险机构，首先压实党的领导责任。要严厉打击金融腐败，坚决查处风险背后的利益勾结，把查办案件、防控风险、挽回损失、堵塞漏洞、重塑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构建金融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